

# 姚著「中國銀行二十四年發展史」

張 朋 園

姚崧齡 中國銀行二十四年發展史：張公權先生建立近代金融組織基礎之成就（臺北，傳記文學社，民國六十五年八月）

近二十年來，經濟史家一直在尋找中國近代經濟成長遲緩的原因，種種說法，至今並無定論。姚崧齡先生的中國銀行二十四年發展史，一本有關金融史的論著，有助於我們瞭解近代中國經濟發展所遭遇的困境。

姚崧齡先生（一九〇〇——），字仲年，國立清華學校畢業，美國彭雪佛尼亞大學碩士，曾任教南開大學及上海商學院等學府。民國二十三年入中國銀行，初任幫核，二十八年升總帳室主任，三十二年兼中國銀行會計處處長，三十五年奉派至美國檢查中國銀行紐約分行業務，三十六年任國際貨幣基金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稽核處副處長（Deputy Controller），次年回任中國銀行。三十九年任總管理處赴外稽核，駐紐約分行辦事，四十六年退休，（時年五十七歲）在中行服務先後二十三年又二月。對中國銀行之歷史，瞭如指掌，觀察中國之經濟發展尤其深刻。姚先生著作甚多，其中行服務記（民國五十七年出版）與本書為關於金融史的姐妹作。

中國銀行二十四年發展史一書，附有副題張公權（嘉璈、一八八八——）建立近代金融組織基礎之成就。很明顯的，本書有兩大主題：一為中國銀行之發展，一為張公權與金融界的關係。所謂二十四年史，指的是民國元年至二十四年之間的中國銀行史。張公權從民國二年出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總經理，六年調北京總行副總裁，十七年任總經理，直至二十四年去職。在張氏的苦心經營下，中國銀行的基礎得以奠定，中國的金融張氏亦甚有貢獻。姚崧齡先生敘述在苦難中成長的中國銀行，反映了苦難的中華民國的命運，文中一字一句均有深刻涵意。

中國銀行是我國最早的國家銀行，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清廷諭命設立戶部銀行，是為該行之誕生，三十四年（一九〇八）改戶部銀行為大清銀行，民國元年改名中國銀行。由於其具有國庫功能，無異於國家之中央銀行。但中國銀行自始即為官商合資的銀行，民國二十四年改組之前，民間資本居四分之三，官方資本居四分之一，故又為一股分有限公司。因為其有官方資本且為中央銀行，難免捲入政潮，而影響其發行信用，又因主要資本來自民間，官民利益難於合一，故終於不能不改組增加官股，完全納入官方控制之下。姚先生對中行捲入政治危機有詳細的敘述，對於歷次之改組則詳略不一，對於二十四年之增加官股，納入政府控制，則欠進一步之討論和分析。

姚先生是一位會計專家，其對於民國金融現代化的歷程觀察至為深入。中國自十九世紀末葉以後，金融市場幾乎完全操縱於外人在華銀行之手。外人控制不到的地方金融，則由錢莊票號分享，中國銀行是一個現代性的銀行，但當其誕生之時，幾乎不能插足金融市場。僅以代收稅款而言，因關稅鹽稅由於條約關係，均在外人掌握之中，不由代理國庫之中行經手，些許存款利益亦不可得。最嚴重的是人民不對其發生信用。大戶存款，以洋人銀行為去處，小戶則藏現金，或以錢莊票號為對象。中行主要營業，居然只是買賣銀元。張公權為了開展業務，鼓勵人民以支票付稅，以銀元存款付息，以銀兩易銀元，或以洋元易銀元，均不收手續費（頁26-7）其苦況可見。

中國銀行在此二十四年間所面臨的最大困難為政府要求墊款。截至民國六年九月為止，中行墊付款項高達五千萬元，而中行官股僅四百萬元，商股不過一千三百萬元，合計不足一千八百萬元，豈非全憑紙幣應付?!（頁 48, 49）民國十二年政府財政十分支絀，將原有的五百萬元股票作價出售，所謂官股，已是有名無實。民國十七年至二十年之間，政府發行公債約十億元，中行承受二分之一，等於墊款五億（頁 111）。

中國銀行的資金有限，政府又一再要求墊款，其所發行的鈔票難取信用是必然的。民國五年袁世凱取消帝制之後，欲合併中國、交通兩銀行，集中現金以對付護國軍，與此有關的一項政策，為發行不兌現紙幣。然因消息走漏，南北發生擠兌。有此一次擠兌，不難發生二次、三次。姚先生對民國五、六、十、十五、十六各年的擠兌均有敘述和分析，並指出擠兌於中國銀行行基頗有不良之影響。（見頁 30-45, 66, 81）因擠兌事件，姚先生特別讚揚上海分行實行兌現以抗拒北京政府不兌現政策的措施，維持中行幣信於不墜。

北洋時期的派系鬭爭最爲激烈，所爭者，控制財政金融系統爲主要目的之一。

（參見本刊另一書評）中國銀行也捲在此一漩渦之中，自民國元年至十七年，該行十易其長。本書的主人翁張公權究屬什麼派系，姚先生並未說明。一般人均以爲張氏屬於研究系（或進步黨）。民國六年張氏由上海分行調去北京總行，當然是梁啓超的關係。原先梁氏似有意以之爲財政次長兼長中國銀行，但由於張氏淡於宦途，其兄張嘉森（君勳）亦力加阻止，張公權的派系色彩並不濃厚。茲錄張嘉森致梁啓超函一通如下，以見一斑：

「舍弟（指公權）接先生（指梁）電，有招致來京之意。舍弟以在申日久，稍有信用，不願離申。而商界中凡人一見於任命，即目爲官場，反將信用損失。森意舍間食指衆多，所以能安居，賴舍弟一人之力爲多。若亦隨森浮沈於政界之中，則一家無以自保。故望先生勿以官職強之。此爲吾一家計，不能不懇於先生者也。」（丁文江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頁五二二）

雖然張公權的派系色彩不濃，當時人視其爲研究系幾無例外。安福系有意排擠張氏，使之離開中行，姚先生在本書中述之甚詳。（見頁 47, 52, 63-5）日後，孔祥熙、宋子文等與張公權意見出入，各自淵源不同，不無關係。

北伐軍抵達上海之後曾獲江浙財團的財力支持，我們在本書中獲得了證實。國民政府的中央銀行於民國十三年八月成立，初時以準備金有限，紙幣信用不高。爲提高信用起見，曾於民國十四年向香港中國銀行通融五十萬元，是爲中央、中國兩銀行發生關係之始。十五年，蔣總司令密電黃郛向張公權商濟現款，中行旋撥三十萬元。蔣總司令至南昌時又接滙款二十萬。中行並同意北伐軍至漢口時，可向漢口分行支取一百萬。北伐軍至上海之後，成立蘇滬財政委員會，網羅中國、交通兩行及銀錢業、商會代表爲委員，並以上海銀行總經理陳輝德爲主委，四行聯合準備庫副主任錢永銘爲財政次長，代理部務，發行「二五庫券」三千萬元，承受者以中國銀行、上海銀行、浙江興業銀行所佔比例最大，中國銀行獨占半數以上。當時上海的金融界鉅子，如陳輝德（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徐冕（浙江興業銀行常務董事）、周作民（金城銀行總經理）、吳麟書（上海紗布交易所大股東）、周亮（顏料業領袖）、張煥文、顧鼎貞（均爲證券交易所大股東）、宋漢章（前任中行上海分行經理）、貝祖詒（在任中行上海分行經理）、馮耿光（中行股東、前任總裁）、陳嘉庚（華僑橡膠業領袖）、李清泉（菲律賓中興銀行總理）、薛敏志（菲律賓中興銀行協理）等無不與中國銀行有關係（頁 84-85, 92-95）。姚先生指出蔣總司令與江浙財團的往來，係由陳其家居間（見中行服務記，頁74~75）。江浙財團對北

伐軍的支持貢獻，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中國銀行與國民政府的關係，姚先生有提綱挈領的討論。十七年宋子文擬以中國銀行為國民政府的中央銀行，因張公權不同意而作罷。張公權不同意的原因，第一，不願意更改中國銀行的名稱，第二，不願意政府的股份超過商股。（頁92）這兩點牽涉的問題很多，姚先生未予進一步的說明。據我們的了解，民國二十四年，財政部長孔祥熙以命令改組中行，不過是民國十七年政策的實現。國民政府成立以來，財政困難，而中行一再要求減少墊款。財政當局認為「唯有完全控制中行，始能對於財政支出之供應指揮如意。」改組後的中國銀行，以董事長制代替總經理制，宋子文出任董事長，張公權調為中央銀行副總裁。（頁 193-195）銀行有公營民營兩類。改組後的中國銀行，雖然民間股份仍居其半，但完全由政府控制，自屬公營類企業。公民營的得失利弊，姚先生未作進一步的說明。

以上大致是本書的主要關鍵問題。張公權對於中國銀行及金融業的貢獻，亦圍繞這些關鍵性問題發展。簡而言之：(一)為了維持中國銀行的發行信用，他公開準備金的數字，反對不兌現政策，收回不兌現紙幣，減少對政府墊款；(二)為了不使銀行捲入派系之爭，於民五擴充商股，使總裁、副總裁久任，不因政爭而人事更動；(三)強化銀行制度，起用新人，組織銀行公會，發行銀行週報，聘請外國顧問；(四)推廣銀行業務，於國內外建立分支行，鼓勵存款，推廣放款。（頁 28-9, 96-107, 196-8）這些貢獻，著者均一一加以討論。值得在此一提的是中國銀行的人才反映了金融業的趨向現代化。就姚先生所提供的資料加以歸納，民國二十三年中國銀行領導階層人士共四十八人，其中留學歸來者二十八人，本國大學畢業者八人；三人有博士學位，十人有碩士學位，一人有傳統功名（舉人），這是其他行業所罕見的情形。（就地區而言，江蘇十七人，浙江十三人，廣東五人，福建安徽各三人，貴州二人，湖南甘肅各一人，英國二人，德國一人。）

本書最值得注意的部份，是其在討論金融問題中反映出來的民國經濟困境。以自組銀行團為例，民國九年英、美、德、日組成四國銀行團，擬對中國貸款，中國因顧慮財政為外人控制，不予接受，以自組銀行團為對策。因此有民國八年梁士詒所組織的中華銀公司，十年張公權組織的車債銀團，上海造幣廠借款銀團，十一年的通泰鹽墾五公司債票銀團等，但均中途擱淺。梁士詒是因在政壇失勢而影響銀團中止。張公權所組織者，或因軍閥干擾，或因人事不能穩定而失敗。由此可知，資本並非絕對不能籌集，而是政局不安或管理不善導致失敗。（頁 77-78）中國在清末受列強壓迫，民國則自相殘殺，政局混亂，經濟當然難於有預期的發展。

從中國銀行的存款也可以略窺資本累積的困難。民國二十年全國有存款二十億，二十二年有三十億，這是一個極其有限的數字。姚先生將存款者分爲四類列表，茲引如下：（頁 114, 138）

存款者 \ 年別	19年	20年	21年	22年	23年
機關	9.89	8.25	4.46	4.14	5.78
工商業	54.23	33.29	33.86	45.66	31.34
社團及個人	35.88	58.46	61.68	50.20	62.88

本表顯示機關（政府）拮据，無餘款存入銀行。工商業在十九年之前，似甚好景，但數年之後則趨向衰落。惟著者未將工業與商業分開，兩者之情況如何，難於辨別。個人及社團存款比例提高，是否表示人民有儲蓄能力？個人與團體的比例又如何，惜姚先生未加說明，甚難作適當之推測。

發展經濟，需要強有力的領導。姚先生討論中國銀行十九年至二十三年的放款情形，表列各類放款比例，茲更列如下：（頁 118, 140, 152-3）

放款項目 \ 年別	19年	20年	21年	22年	23年
商業	20.14	21.79	22.38	27.02	29.77
工業	6.57	10.14	11.46	12.08	13.35
公用事業	0.94	1.08	1.19	0.97	1.08
同業	14.92	15.02	18.92	6.56	2.15
團體	1.94	1.37	0.60	0.73	1.08
機關	48.92	47.19	42.61	43.90	41.91
個人	4.56	3.41	2.84	2.52	3.23
農業及農產	—	—	—	4.81	5.38
交通	—	—	—	1.41	2.15

仔細觀察各項放款，工商比例有逐漸增加的趨勢，是一個好現象，但為數遠不如對機關放款。可見領導者尚未注意到積極發展工商的重要性。商業性放款大於工業性者，尤反映工業缺少發展機會。工業不受重視，農業、交通、公用事業更是微不足道，由此可知，中國現代化的延誤不是沒有原因的。

以上大致是姚先生所討論的內容。讀完全書，頗能因著者的提示而進一步體會民國時期經濟發展緩慢的一些原因。姚先生在處理本書的許多問題時，因為是當代人論當代事，著筆甚為謹慎。但讀者不難由書中看出姚先生立場之客觀，見解之深入。

最後應當一提史料問題。姚先生所徵引的史料有許多是至為珍貴的。例如張公權的「隨筆」，是未嘗公開過的個人感懷記錄，不僅有張氏對當時金融財政、經濟的觀察，同時亦有對時局的批評。將來一旦全文公開，對民國史的研究，必然多所助益。其次是中國銀行本身的出版品。張公權當年推動銀行金融研究，特別發行中國銀行報告、銀行週報，及不定期特刊，這些出版品，今天都成了研究金融史、經濟史不可或缺的史料。姚先生得力於這些出版品，無一事無所本，無一字無來歷，雖然姚先生省略了許多應有的注釋。此外，姚先生還親自與張公權談話多次，利用「口述史」的方法，請其主人翁回答一些重要的問題，書中均已一一引錄。因此，本書不僅是一本學術性的著作，同時也是足供後人參考的第一手珍貴史料。